

“脱嵌型”失范处境与职业抑制

——基于华中某产业园区的经验观察

金小红 许松影

摘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通过描述剧烈社会变迁中新生代流动劳工职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延续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职业团体/规范—个体自由”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社会解组和规范真空状态,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与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作为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要素,制度化的职业团体和职业规范通过为个人提供稳定而坚固的组织关系和行动规范,增强不同职业类型中职业收益、职业时长等因素对职业生活的正向影响,保障职业环境中“社会性”庇护关系与制度性庇护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避免流动劳工“脱嵌”型职业失范的发生。在学理意义上,从产生社会整合“条件”的角度,对流动劳工的职业失范状态进行了解释;在政策意义上,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转型;职业团体;职业规范;失范抑制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5.012

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建设开始,国务院陆续批准设立了若干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理性化的工业园区建设在达致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近乎彻底地改造了原地区的社会团结模式,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建立”^①。工业园区,作为一种具有规划色彩的新型综合生产与生活社区,既不同于建立在传统纽带关系上的“江村”社会生活模式,也不同于建立在“自发式”流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浙江村”社区组织模式^②。那么,生活于工业园区之中的新生代流动劳工经历着怎样的职业生活?在一种方法论层次上,本文在观察和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时,借用了职业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韦伯的理解方法论原则,但是试图再去进一步解释这些“主观意义”的内在脉络和机理时,则更多延续了涂尔干关于“职业团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分析框架。

一、新生代流动劳工的“脱嵌”特质与职业生活

1.“脱嵌”特质。学术界用以描绘流动劳工的“脱嵌”特性是乌尔里希·贝克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个体化”过程^③。“新生代”的“新”在学术界的研究笔触下,表述为“无根的群体”,意味着“主体性”嵌入主体社会结构的缺失,而表现为“脱嵌”特质。这种特质体现在三个相互联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8VJ06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快速社会变迁背景下新时代流动人口的‘脱嵌’危机与失范研究”(18BSH028)。

作者简介: 金小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武汉 430079; 82974049@qq.com);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 245722792@qq.com)。

① 费孝通:《书后》,见史国衡:《昆厂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0-235页。

② 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0-21页;张鹏:《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52、96页。

③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5-157页。

系的层面:其一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化趋势,展现出自我意识增强及经济理性的行动方式^①,但是个人资本弱势导致他们的适应性困境;其二是中观层面,流动劳工作为一个群体与新职业及社区的疏离,表现为“脱嵌型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主体、形式和内容不再受职业内部人际关系、组织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职业场所之外的社区、城市的社会联接所制约^②;其三是宏观层面,流动劳工对于主体社会结构的疏离,主要体现为城市社会根据流动人口内在需求而提供服务与制度供给略显不足^③。

2.职业生活。关于流动劳工职业生活的国内外社会学经验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经典马克思的阶级视角延伸开来的劳动过程及劳工工厂政体的研究;二是以经典韦伯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视角延伸开来对职业流动的研究,文献集中于流动劳工职业流动(向上、水平或者向下)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分析市场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影响^④;三是以经典涂尔干的“集体意识”视角延伸开来的流动劳工社会组织生活的研究^⑤。

张鹞与项飏的研究与本文关联较大,提供了较多启示。张鹞围绕“浙江村”流动人口的社区及职业生活,特别分析了在新的“非正式空间”权力争夺中,流动人口的民间“非正式组织”作为自我管理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官方力量之间的“非正式庇护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模式带来的暂时的社会稳定及内在的隐秘与显现的社会失范后果。^⑥具体体现为:一是官方意义的权力寻租行为,即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二是流动人口内部犯罪组织与行为的产生,这一点在项飏关于“浙江村”的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到印证^⑦。然而,本研究所观察的工业园区新生代流动劳工群体的职业处境却具有明显的“脱嵌”特质,与“浙江村”有很大差异,并且代表了现在很多地方经济改革中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生活样态。

二、涂尔干“社会—职业团体—个体”的理论框架

(一)涂尔干“社会—团体生活—个人”的理论命题

社会在涂尔干的笔下经常被表达为“自成一类的社会”,有多层次的含义。涂尔干首先证明了社会的自然正当性,他引用斯宾塞的观点,认为社会的进化是由简单的小集体到较大集体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也有自己的起点,这个起点基本是与个体同步的。其次,涂尔干假设了“社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实在性,确立了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社会规则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统摄性,是一切其他经验情景中具体的契约性制度的先在原则^⑧。涂尔干没有讲社会规则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们只能从其各种表述中体会到它是借助公共节日、庆典和各种仪式等集体表象来表达,并通过概念和范畴、思维和理性、语言和宗教等形式来呈现的^⑨。最后,在现代劳动分工状态中,更为具体及重要的“社会”,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与《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详细分析的职业团体生活,它形成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的意义也具有统摄属性,是现代分工社会中的基本“集体意识”,具有实现有机团结社会的功能。

现代“社会”如何才能达成整合?涂尔干阐释了系列理论命题,需要结合他的四本主要代表作来

① 张红霞、江立华:《个体化变局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脱域”与“风险”》,《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孙中伟、杨肖锋:《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社会》2012年第3期。

③ 关信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④ 李斌:《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从“刚性”走向“渗透”》,《求实》2004年第1期;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社会》2011年第6期。

⑤ 史国衡:《昆厂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⑥ 张鹞:《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⑦ 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⑧ 李英飞:《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社会》2013年第6期。

⑨ William Miller W., *A Durkheimian Quest: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2.

归纳(从这个意义上讲,涂尔干提出的是研究假设,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与检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分析了个人与集体生活的关联性、仪式化社会组织生活产生相应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意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功能的理论命题^①,《自杀论》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整合失效及社会规范的缺失与混乱导致社会失范现象的理论命题^②,《社会分工论》又分析了在新的社会分工状态下实现有机团结的基础条件之一是重新建立合适的社会纽带关系的理论命题^③,《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提出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纽带关系依托于职业社团生活、职业社团生活过程内在产生职业伦理并延伸至公民道德、进而达成社会整合的理论命题^④。总而言之,这几本著作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命题循环圈,其中的核心要义是:合理的集体生活形成合理的社会规范(相应的集体意识),进而达成有效的社会整合,从而抑制社会失范。另外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涂尔干那里,道德、规范、伦理等同属于一种“集体意识”范畴,具有一种社会层面的约定性。

(二)涂尔干“社会整合—职业‘集体意识’—个体自由”的理论框架

涂尔干关于职业的分析,是与对失范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在《社会分工论》与《自杀论》等作品中,他认为,失范意味着一种社会规范的匮乏状态,集体意识无法限制个人欲望,原有的社会机制失去控制力,道德生活领域体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作为应对之举,只有借鉴历史悠久的职业法团样式(当然是适应新历史条件的样式),才能将已经被时代变迁原子化了的个人结合起来,个人才能具有抵抗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官僚制国家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涂尔干试图在关于“社会整合”的研究领域中构建一个研究框架,即社会整合—职业“集体意识”(职业组织/职业规范)—个体自由,它可以被视为社会—团体生活一个人的次一级框架。

涂尔干对社会失范的分析,主要指的是社会规范层面上的,他对个体层面的研究还不成体系,主要散见于对反常的自杀率、失范的社会分工的分析中,然后就直接跳进了对如何抑制失范的分析。其后的承继者罗伯特·K.默顿在《Anomie, Anomia 以及社会互动》^⑤一文中对社会失范与个体失范进行了明确区分:社会失范主要指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体失范主要指源于社会失范而产生的越轨行为等。然而默顿对社会失范及个体失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缺乏明确的说明,有学者认为还是要回到涂尔干的“集体意识”中去讨论。根据涂尔干理论的本意,个体也体现为二重性,它的发展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个体化,即个体作为自主性主体;二是社会化,即社会通过纪律等手段使个体具有了自我规定和自我控制的道德实践能力,是集体意识在个体身上的展开及延伸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应该同时重视对个体失范状态的研究,即无意义感、无权力感和无规范感等。^⑥

尽管失范研究在涂尔干之后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我们认为,职业团体生活作为克服失范的方式,涂尔干对它的强调并未丧失其重要性,但近来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只是在政治社会学中得到了若干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中的某些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践行了一种带有涂尔干色彩的研究。与单纯的社会调查不同,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与费孝通多部作品的主题相一致,针对的是“乡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伦理格局及其破产”^⑦,这些问题根本上表现为乡土中国与机器文明的对峙,需要借助于团体和教化来缓解这种对抗。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我们再度面临着与当初一样的社会问题,并且其具体的冲突地点已经不再局限于现代

①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②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③ 埃米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Robert M., “Anomie, Anomia,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 Glencoe: Free Press, 1964.

⑥ 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3-75页。

⑦ 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工厂或企业之中,产业园区在当代已经实质性地理性化为一个现代企业^①,成为一个多种力量交织的汇聚地。因此,透过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棱镜重新激活涂尔干的遗产乃是必要的。

本文希望从“社会整合”角度提供一种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以职业经历为核心勾勒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劳工群体的职业生活,从而依据“社会整合—职业(团体与规范)—个体自由”的理论框架指导经验问题,探讨职业在当前社会问题中的状况和功能潜力。

三、调查方法及资料收集

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理论与方法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制约性条件,本文将研究范围确定为华中地区一个包含了十个自然村落的新建工业园区,力图继承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区研究”或“社会学研究”,尝试进行一种涂尔干式的劳工社会学分析。由于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新生代流动劳工群体的职业生活状态,因此有关工业园区基本建设、政府规划、经济环境等内容具备背景意义的重要性,此外,关于新生代流动职业群体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所分析问题来说也非常重要。资料收集主要采用了实地调查法及半结构式访谈法,本研究设计了包括10个问题在内的半结构访谈提纲,并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的7-8月开展两次深度访谈。调查者一共对20名职业人员及2名辅助人员^②做了访谈,这些被访者的年龄集中在18-45岁之间。

虽然本文的重点关注对象是新生代流动劳工,但是为了比较分析,访谈对象的职业类型涵盖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类型(国有/事业及非国有/非事业),实际上包括了政府公职、教师、电子商务、铁道事业部门、流动务工、本地个体经营以及暂无职业等身份人员。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的,流动劳工往往身处非正式职业类型(次级劳动力市场)^③,而正式职业类型作为本次研究的一种参照对象的“理想类型”,在这里并非意指这个群体的职业生活没有问题,而是源于日常实践中,人们眼中正式职业是“稳定、受尊敬、有保障”的一种形态。

四、新生代流动劳工的职业生活:宏观背景与职业生活

(一)宏观社会结构变迁

在进入21世纪之前,该工业园区所在的地区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带,绝大多数劳动群体均以务农为生。2006年,地方政府积极谋求经济发展,在附近约10个村庄中广为征地,迁入或新建一批轻、重工业工厂,设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称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地方政府还制定了配套的行政管理方案,把若干行政村以及涉及市区和其他镇区的一批地界进行集中管理,设立了独立的园区行政管理部门,其党政部门包括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党政办公室以及多个部门局和开发中心,对辖区内的种种活动进行管理,理论上这些村庄不再受早先镇政府的管辖。

从政府治理上看,近年来该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意图,亦即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扮演了经济厂商和政治管理者的角色。这一有规划的深度变迁引起了原初状况方方面面的变化,其本身也是一场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务农而选择进入工厂,但与此同时,除了常规性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养老、医疗等问题之外,包括征地、环境污染、利益保护(被占地村民是否有权从新建工厂得到利益)、库区移民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相当不完备。

① 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辅助人员指的是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的官方人员。

③ 李斌:《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从“刚性”走向“渗透”》,《求实》2004年第1期。

在这里涉及调查的“可及环境”与“不可及环境”的分界,因为进入条件的限制,国家—市场的部分仅仅作为本文的研究背景而加以参考。如前所述,本文的研究将紧扣“社会”中的次一级框架,即主要探讨“社会—职业—个人”的关系。

(二)新生代劳工的职业生活

作为一种总体的生存状态,职业生活是一种多维的存在,构成它的要素并不单一,甚至在层次上也不单一。

1.直接要素——职业类型、职业环境、职业收益与从业时长

(1)职业类型:社会声誉与经济理性并存。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公务员与事业编制往往在语义上和稳定、受尊敬、清闲、教育良好等联系在一起,最为重要的是,职业本身所处的较高价值等级使得投身其中的个人能够获得满足感和尊重,由此也更加认可自己的职业。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目前在烟草系统工作的被访者,他是一位国家公职人员,在访谈中清楚表达了如下主张,并且坚定指出这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一再听到的“实在话”,即“公务员是政府的人,说话能够算数,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异于常人的尊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获得额外的收益”(访谈资料:20180802-ZY)。

然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在逐渐削弱这种优势,一方面,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说房价急速升高,非政府部门及非事业单位相对较高的收入会对新生代劳工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法制建设的完善使得非政府部门及非事业单位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辞退员工,并且必须要给员工们提供足够的福利,这大大加强了职业的稳定性。例如一位被访者就向我们表达了他自己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和稳定性,即便这多少有损他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访谈资料:20190725-ZQ)。我们认为,这并非削弱了职业性质的影响力,而是改变了职业性质的内涵,从原先的国有/非国有或事业/非事业逐渐转变为正式/非正式,这样的内涵变动显然与理性化趋势^①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2)职业环境:工厂中的群体—支配关系。在部分劳工研究社会学家看来,一起工作的工人往往有可能形成一种预备阶段的阶级意识,而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与制度安排则力图干扰这种共同意识的形成,从而避免出现工人的集体行动,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曾得到极为深刻的展现^②。

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微观权力与派系团体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华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描绘出的状况在本地区中没有实质性改善^③。横跨多种具体工作的物理空间始终是人际关系的舞台,资历老或者职位高的师傅、管理者把持着利益分配的权力,而为了获得更多收益,领导者和普通工人采取了实质理性的行动策略。前者倾向于在熟人网络中分配更多利益,或者是用利益捕获可使自己更长久获益的人,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小团体;而后者则希望能打入这一封闭性的小团体,用烟酒“敲开”它的边界,使对方将自己接纳为团体中的一员,由此获得更好的工作分配和更理想的工资回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企业中,团体可以分化,但是它的规模必须得到控制,由于这种团体的进出流动性非常差(实际上,被排斥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一旦发生了就有可能引起团体的分化),这就意味着有一些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其中,即使他试图用利益作为工具去穿过那一道界限(访谈资料:20180803-HK):

——你不要说什么有没有经验,你不是别人的人再有经验都不中,我去过的地方总比你多吧?就问哪个地方不这样?法律一套一套的,工厂规定一套套的,有人管没有?那些头儿本身就是靠关系进来的,你不送东西到时候给你减几个工怎么说?有那老干家,带一群徒弟,那就是一霸,人多也是不怕,咱又不是一伙儿的,有时候你送礼都不收。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正是这种影响了正常的劳动与回报相挂钩的关系网络的存在,导致被访者认

①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②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1、497、980页。

③ 安德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为自己无法彻底投身工作之中,更无法长久地留在同一个地方。不少被访者都抱怨自己从未被接纳过,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被工作本身所接纳,而是获得一个小团体的成员权。这直接导致他们对工作的不满,以至于在多种程度不一的刺激——诸如工资被无端损减、劳动量很大且危险但收益更少、生活中受到小团体的敌视等——之后终于愤而离开。

(3)职业收益:对职业生活影响的不确定性。更一般地,有限的访谈资料显示出,该产业园区的劳工群体中,收入处在3500-6000元/月之间是一种常态,较低的收入并不必然导致反社会的心理与行为,而较高的收入也并不必然与这些问题绝缘。

从假设上分析,职业收益越多,职业人的生活越体现出积极的效应。但是相关被访者表明,尽管他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中收获了不寻常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却没有帮助他完全摆脱生活中的焦虑(访谈资料:20180726-PJ);而根据另一位被访者的说法,他的姓名还出现在派出所那些被指认曾经吸毒的人员名单中(访谈资料:20180803-JT)。

一位被访者尽管是失业在家,但是他觉得自己从乡村中赚钱的能力更胜一筹(这体现在空闲时间更多而不是赚钱更多)(访谈资料:20180803-JT),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如上职业环境所述,人们对收入的不满往往与不公的感受相关,是收入和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并不匹配,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得到的非财物性歧视。如果这些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了眼前的需要,那么就没有必要冒违反社会规则的风险。

(4)从业时长:职业行为与职业认同的稳定化。可以合理地讲,人们之所以会长期从事一项工作,那是因为他/她认同这项工作,并且能从中获取足够的收益,但是这种单向度的说法令人怀疑,因为它忽视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职业惯例”以及需要成本的退出机制。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中,作为小学教师的被访者已经从事自己的工作近20年之久(她是18岁入职的),在访谈中,几乎感受不到她任何情绪波动,但是她对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又是心知肚明(访谈资料:20180806-ZML);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位曾经从事电气行业的被访者,他曾经在一年之内更换了三个工作地点和四种不同的具体工作,他认为只有收入和工作顺心才是重要的,完全没必要在一种工作上耽误太多时间,长期从事一项职业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访谈资料:20180803-JT)。

这里可以暂时抛开退出机制的成本问题(并非因为它不重要,而是与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关涉不大)。在正式职业类型中,长期从事一种职业往往有助于形成一种职业惯例,这并不单纯是对职业本身的认同,而是一种实践中的行动方式,常常是以主体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在运行着,正是这种职业惯例强化了职业认同,避免职业者和职业之间产生无法挽回的断裂。与此相对应,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非正式职业中,为什么“职业惯例”形成相对困难,从业时长常常表现为“短工化”倾向,进而造成流动者的“脱嵌型雇佣关系”。

2.间接要素——家庭、婚姻、同辈群体与受教育程度

在访谈中,我们就被访者个人背景的相关内容也做了了解,特别是家庭、婚姻、同辈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这四个方面。很多个人经历都显示了以上这些间接因素是与流动劳工的职业经历正相关的,亦即职业者越是在这四个方面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压力,也就越不会陷入一种脱嵌型的职业经历中。一个案例明显地体现出同辈群体的间接影响,被访者具有大学学历,接受访谈时仍然在工厂中工作,但是相对于他的同龄人来说这份工资却略显寒酸,尽管他是乡村人口中的“坐办公室的人”,以至于他希望辞掉这份工作另谋生计(访谈资料:20180811-LXB)。

综合以上描述发现,非正式职业由于经济上可能的高回报性,对于流动者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从业时长及职业收益对于流动者建立稳固的职业生活影响有限,他们往往受制于微观职业环境,尤其表现在他们在职业环境中(主要是工厂)无法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庇护与制度性庇护关系,而这一点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五、失范处境与职业抑制

(一) 新生代流动劳工群体的失范处境

1. 职业团体生活的变化: 乡土地缘社会网络关系——“原子化”的“脱嵌”生活。被访者中, 在职业流动之前, 家庭构成了他们最重要的非生产性场所, 尽管家族网络的色彩相当单薄, 然而学友、工友等组成的无形团体相当常见, 在工作机会和“成员”家庭困难或者婚丧嫁娶等需要帮助时往往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例如说通过这些私人关系借到的钱并不需要支付利息等(辅助访谈资料: 20190813-XXT)。

除了正式职业类型的员工外, 在很多非正式职业类型中, 对于那些频繁更换职业的被访者来说, 流动不仅影响了他们专业技能的提升, 而且使他们无法建立起与职业内部及外部的稳固关系网络, 工作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差事——是“没意思”的, 这一点在被访者中并不缺乏明晰的认识(访谈资料: 20190816-LB、20180803-JT)。

2. 职业规范: 国家—市场框架下的“形式化”规范约束, “权利”与“义务”无法联结的职业伦理。近来的失范研究偏重宏观一面, 主张政府应该主动地制定遏制经济无序发展的政策, 保护和培植市民社会中的普通成员, 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克服社会的失范^①。然而本次调查显示, 国家法律和工厂规定远远不能为个人的职业经历提供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计划, 相反, 在工人们眼中这些内容更多的是空话和妨碍; 不仅如此, 工厂的规定也并不能阻止私人关系的成长繁殖, 更无法消除因派系而产生的冲突和纠纷, 这个时候的处分在工人们看来往往无足轻重, 因为横向的派系本身就是纵向依附关系的一个结果, 所有规定的执行都取决于领导权力的大小(访谈资料: 20180803-JT、20180803-HK、20190813-JB、20190726-PJ、20190829-XX)。贝克意义上的自由劳动仲裁关系, 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被他们轻易选择, 而用于处理自身工作中的问题, “用脚投票”反而更为简便直接, 这是引发他们频繁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

由于社会所公认的职业规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没有得到遵守, 职业者就会在多次经历后蔑视一切成文规范, 斥之为表面文章, 而接受某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者庇护关系的绝对支配(访谈资料: 20180803-JT、20180803-HK、20190813-JB、20190725-FT)。同时反映在劳动者身上, 除特例外, 很多被访者对待自己职业的态度往往是漫不经心的, 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和任务安排, 即便是有正式的规章制度, 仍不免经常因为其他事件而将工作的优先性降低(访谈资料: 20180803-JT)。

——你这个……厂里肯定都规定说不能干私活儿吧?

——那厂里还规定说不能随便扣钱啊? 大大小小哪个没有扣点分儿?

——那规定就是这个……

——不是规定就是这个, 是不想给你恁些钱才有这规定。正常的话我一个月拿六千多, 问题是没有一个月没有叫扣过钱, 有人专门干这个, 挑你毛病, 规定是管理你哩, 你当是保护你? 保护老板还差不多。

“原子化”的“脱嵌”职业生活大大弱化了乡土意义上的“社会性”庇护关系, 他们与职业体系及政府的契约关系远未成熟, 使得他们无法通过正式制度化的途径解决职业中的问题。根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 流动人口的职业保障相对比较差,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户籍门槛外, 还主要表现为工作保障差、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贫乏。劳动合同签订率和连续就业时间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合同制工人的比例仅为 29.1%^②, 全国流动人口跟踪调查数据表

① 吴宗宪、张威:《制度性失范理论述评——美国梦与犯罪的理论阐释》,《刑法论丛》2016年第4卷。

② 肖子华主编:《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明平均只有 15.22% 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失业保险^①。

3. 个体围绕职业而形成的失范感蓄积。被访者或多或少表现出无法掌控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及无法由职业内部拓展强、弱关系等状况,而与之相符合的则是对诸多正式职业规范的不认可,这种状况与他们的无力感、无意义感及无规范感相匹配。在这种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中,身处其中的劳工更容易陷入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很难用“秩序”来预计自己未来的前景。他们除了更为频繁地更换工作之外,有时候也会在自己的行动和由工作不顺所带来的反社会情感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访谈资料:20190805-JLL)。

(二)失范的职业抑制:职业团体与职业规范的潜在力量

调查显示,在流动劳工中,超越于不同职业类型及不同小利益群体的“稳定”职业团体生活是匮乏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关系中,如果没有国家契约的强力保护,“原子化”的个体在职业体系内很难稳定立足,并自动生成具有多向调节及控制功能的职业伦理。职业收入、从业时长对调节职业感知虽然具有部分功能,但是个体因素对职业选择与流动产生了重要的随机影响,这主要源于职业群体缺乏对本职业长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涂尔干的理论框架来看,被赋权的职业团体与职业规范本身才是克服此间失范的有效途径,而调查结果多少印证了涂尔干的主张。建立现代职业团体,并赋予其合法化权利,引导非正式职业内部的纵向及横向关系网络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以规避“非正式的庇护关系”的失范后果,给予个体职业人以坚实的心理和现实支撑,促使职业收益与职业时长对职业生活产生正向关系,以达到正式职业类型在此方面的诸多效果。在此过程中工厂中的派系与关系网络反而有可能成为正向的价值资源,曾多次更换工作的被访者也认同这一点(访谈资料:20180803-JT)。

另一方面,与稳固的职业关系或多或少存在关联的,正是对职业规范和社会规范的较高认可,在其个人方面,往往也没有较大的偏差行为,甚至其心理状态也是更加正常平稳的,较少出现负面情绪。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调查中(访谈资料:20180806-ZML):

——老师就有做老师的道理,身边的同事也是一种压力,会让我自己想着怎么样当老师才最好。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特殊,关系到教育的事情就不能马虎的。你说的我也明白,到哪里都要看钱,这是个基本道理,也不用太夸张。我们教育学生当然也要求成绩,不过当老师的还是想既教书又育人,让孩子们知道一些道理,还要教给他们怎么做一个好人。你有这些想法就不能轻松啦,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社会解组和规范真空状态,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与国家的力量来解决。尽管在因果解释的严密逻辑上,涂尔干有关失范的研究存在问题,但将合法化职业团体与职业规范作为构成社会整合的关键要素,提升为应对社会失范的措施,仍然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经验调查显示,工业园区职业类型分散,劳工流动随意,不像“浙江村”和“江村”内部有一个相互支撑的职业体系和相互往来的人际网络“关系丛”,这些劳工相互之间很难持续分享共同的职业目标和职业资源体系,没有共同的集体生活,难以形成“共同规范”,而相对封闭的集体生活才能形成稳定的规范,这在科尔曼的研究中也得到论证^②。工业园区“社会”发育的不足,使得身处其中的劳工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关系网络再生产都变得困难。

^① 肖子华主编:《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4页。

^②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根据工业园区劳工的自我解释,笔者得出,职业类型是工作稳定及收入保障的决定因素。研究显示:职业收益与从业时长常常只能在正式的职业类型之中对职业认同及职业规范产生正向影响,而“社会性”庇护关系也常常依附于正式的制度庇护关系;新生代流动劳工群体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程度不一的心理与行为失范,这与他们常常处于流动中的非正式职业类型、经历“脱嵌型”职业生活有密切关联,他们可以触及的社会网络与制度关系无法形成良性的互动,同时与中观机制(新的职业团体等)发生了断裂,很难“嵌入”新的制度化职业体系中。

本次调查的结果并非意在或者能够去说明整个工业园区的社会失序,从外观事实上看,它具有“国家框架”化下的“总体有序”^①,而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重申基于日常实践生活立场的“社会失序”问题及探讨可能的策略选择。针对中国本土情景的具体操作,还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推进,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给出了很多有益启发,比如在国家—市场框架之外重构党团组织、工会及行会的身份、功能和组织方式,也许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同时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引申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精神的题中之意。

The “Disembedding” Anomic Situation and Occupational Restraint —An Investigation in an Industrial Estate Located in Central China

Jin Xiaohong Xu Songying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P.R.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professional problem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Sharing from Durkheim’s anomie analysi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restraining the state of anomia,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issues arising from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the state of no specification can’t rely solely on the market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s key eleme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ize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norms both play a role of their own stability in providing individuals with solid and stabl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and specification.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income, du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occupation types on occupational behavior will be enhanced,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asylum relations will be ensured. All of the above will help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occupational anomalism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analysis,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ains migrant workers’ status of anomie/anomia from the view of “conditions” of producing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his paper is a reflection on the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Key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Occupational group; Professional norms; Anomie inhibition

[责任编辑:陆影]

^① 项飏:《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